

中国人学者看到的「中日友好交流」

——兼谈东亚同文书院大学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赵建民

「中日友好交流」，这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所以，我就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谈谈对「中日友好交流」的体会和认识。

一、「中日友好交流」是中日关系史的主流

中日两国关系从地理、历史上说，既是近邻又是善邻。中国当代大文豪，已故的郭沫若先生曾作的诗词：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葦可航。昔鉴真盲目，漂溆东海；晁衡负籍，埋骨盛唐，形同鱼水，情比肺肝。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

郭沫若氏的这首诗，不仅讲到中日两国的地理关系，而且以鉴真和晁衡（阿倍仲麿）两人的事迹说明中日文化交流二千年的友好历史。「中日友好二千年」，这是确实确实的。这就是从中国汉光武帝（公元五十七年）给日本国王的「汉倭奴国王」金印称起的。这是中日关系有文字记载的见证。

郭沫若诗中讲到的晁衡，鉴真成为中日友好“民间使者”的代表，他们为两国人民千年传颂，至今在西安，奈良都有纪念他们的标志性建筑物。在西安有阿倍仲麿纪念碑。奈良有唐招提寺（鉴真纪念馆）；在西安还有空海纪念碑（青龙寺）。空海从惠果和尚处学成归国，在高野山创立佛教宗派——真言宗；他的书法特别有名，素有日本的“书圣”之称，他曾在中国宫廷的壁上补写一个掉字，竟能与原来的毫无差异。室町时代的荣西和尚从中国传来茶种、茶树，并著书《喫茶養生記》……可见，佛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纽带。

近代以前，中日间的交往，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先进文化，推动了自身的社会发展。到十七、十八世纪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水平大体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两国的汉字（从公元五世纪王仁到朝鲜传去论语为始）、佛教（从六世纪到十六世纪）、中国的佛教宗派绝大多数传到了日本）、儒学（从王仁开始，经奈良、平安，直到德川时代成为日本儒学的鼎盛，以至日本在吸收欧洲文化中也发挥作用）、律令（从大化改新起吸收中国律令，《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颁布，成为法

式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成为中日两国相互沟通的道具，奠定了中日友好牢固的思想文化基础。这里展示由中日的书道家挥毫的两个条幅，溶汉字、佛教、儒学、律令于一体，正是凝聚着中日两国之间的“千年友谊翰墨香”。

另外，在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的过程中，互为桥梁作用。中国比日本吸收欧洲文化要早得多。远在古代，日本是通过西安吸收到欧洲文化的，现在京都的正仓院所存的五弦琵琶、玻璃花瓶等物可作证。如果以基督教作为欧洲近代文化算起，那么，传入中日两国时间大体相近。最早到日本传教的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サウエル）在一五四九年从印度到中国再到日本的。当时的澳门是东亚最大的商业港，也是葡萄牙人在远东传教的中心地，有“东方梵蒂冈”之称。

十七世纪中期以后，实行“锁国”政策的日本，通过中国的“汉译洋书”吸收欧洲文化。例如“几何原理”、“天文答问”等欧洲的科学著作，就是经过中国传到日本的。到十八世纪中期以后，作为日本近代科学胚胎的“兰学”兴起，也是跟中国的传统学说思想有关。例如一七七四年日本最早翻译的欧洲医学著作《解体新书》，既是在中国的儒学政治思想影响下译成的，从此，像“滴油入水，布满全池”，兰学在日本的全国范围内兴盛起来，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汉学文化很兴隆。兰学正是把欧洲文化嫁接在汉学上所开出的鲜艳之花。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大规模地吸收欧洲文化，中国仍然起着启发和促进作用。清代魏源在一八五二年编纂的《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传到日本后，如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读之，演出了尊王维新的活剧，该书对日本当时如何强化海防、防御侵略具有启发作用。一八五三年日本开港，与之比之早十余年开港的上海，有着频繁

的贸易往来，因此，上海的“十里洋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尤似西方世界，成为日本学习“西洋”的一个窗口和解欧洲事实的摄取地。同样，日本也成为中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的重要媒介。一八九八年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就是以明治维新为蓝本的。一八九六年开始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截止一九三七年总共有五万多人，其中最多的一九〇六年高达一万二千人。在中国派遣留学生同时，日本政府选派教师到中国执教（教习），到一九一一年为止，大概有五、六百人，占中国的外籍教师数的八四%，留日学生和日教习成为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两个“车轮”。还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是由日本作媒介的，一九〇八年《天义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就是堺利彦的日文本翻译成中文本的。

以上的例子均说明了中日友好交流，对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都是有益的。相反，如果两者对立，甚至发生战火，那么，不论是赢家还是输家都没有好处。如中日关系史上发生多次战争，最早是公元六六三年白村江之战，战火发生在朝鲜半岛；一七七四年、一七八一年忽必烈发动两次征日战争；一五九二年、一五九七年丰臣秀吉发动两次侵略战争；一八七四年日本侵略台湾；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清）战争；一九三一年开始的十五年中日战争。这些战争对两国都不利。如忽必烈两次征日，出动了几十万军队，结果大部损失，战败而归；日本虽然抵抗取胜，但损失也很大，原有的御家人制度不能继续，国力衰弱，终于在一三三三年幕府也遭垮台。丰臣秀吉两次征朝，中日交战，结果丰臣秀吉的政权垮台，连家族也趋消灭，而中国虽然取胜，但也因财力耗尽，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本世纪三〇、四〇年代的中

日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历时最久、战场最大、双方损失也最巨大。这在中日关系史上得出一个深刻的教训：和则两利；战则两伤。显而易见，“中日友好”不仅是两国人民的愿望，同时，也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最好选择。

二、面对现实，相互理解促友好

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到今天是来之不易的。从战争到友好，“化干戈为玉帛”，这是经历了前辈们不辞辛劳地努力所取得的。这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有人为改变中日关系的僵局而辛勤地工作着。他们中有政府官员，社会活动家，民间企业家，也包括无数的无名人士所开展的活动。从一九七二年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一九七八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总算结束了中日敌对的战争状态，翻开了中日关系史新的一页。从此以来，虽然中日关系主流是好的，但摩擦、矛盾也屡有发生。如教科书问题、光华寮裁判、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问题、《日美安全保障宣言》及新指针等等，这些问题使中日关系的友好热度有降温。

那么，对这些问题该怎么看呢？我认为，可以说相互缺乏对对方的理解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不能相互理解，致使矛盾摩擦时隐时现而得不到妥善解决。例如，教科书问题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对日本近代以来对外侵略活动所写的内容已经是够少的了，而日本官方非但不加以补充，不让人们知道历史的真实，反而把侵略改成了“进出”，藉以篡改历史、歪曲史实。这怎么能从历史中去吸取教训呢？

再如，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原来是明治维新时期戊

辰战争中英勇作战而牺牲的烈士陵园，相当于中国的“革命烈士陵园”。但后来把对外侵略战争中的一些实物放进去，特别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又把东条英机等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也放进去了，加上以政府首脑身份去参拜。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抗议。其实，像这样的问题，从相互理解的角度讲，问题也不难解决。本人曾建议：从日本人的原始宗教信仰角度说，“参拜”是对死者的一种崇敬，但对过去的一些战犯也去崇敬显然是不妥当的。那么，既有这个场所，是否也可以稍作变通，既能符合日本人的信仰习俗，又能顾及到东亚各国人民的思想感情，是否可以把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神位迁出，安置在另一个地方，让他们的家族去瞻拜；更好的办法是，在现在靖国神社的正门树立一块石碑，并写明靖国神社的经历，特别说明“这里存放的物品及神社中，有的是在对外侵略中发挥了作用的实物和人物，它（他）们既带给了亚洲各国人民莫大的灾难，也给我们日本最后也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样的历史决不能重演。参观者们要牢记这一血的教训，坚决走和平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如能这样做，不是可将靖国神社从“宣扬军国主义的场所”变为教育人民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教育基地”了吗？

以上列举的问题说明，在中日关系中所会出现这个、那个问题，其重要的原因由于缺乏相互理解。现在的问题是，双方应该持“设身处地”、“推心置腹”的态度来对待。只有本着“相互理解”、“彼此信任”的态度，采取适当的方法，才能使萌发出来的矛盾、冲突得到避免。

三、珍视历史，开拓友好的未来

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总的说来是健康的；对于未来发展的前景，一般也可以说是乐观的。但我觉得，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要把友好的工作扎扎实实地去做，不能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

去年十一月间的江泽民访日，不知各位作怎样的评价？从我作为一个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者，同时也很关心现实中中日关系发展的中国人说来，江泽民来日访问，安排在早稻田大学的讲演，可以说是讲出了中国人民的心里话，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既不能算老账，也不能忘记。令人遗憾的是，在日方的各种新闻报导中，千篇一律地报导了会上有人捣乱的情景，还画了漫画「马場のぼる」。早稻田大学的创办人大隈重信，他创办早大有功，但在中日关系上，当他任首相期间，一九一五年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发生了多次中日非友好的事件。所以，早大现任校长奥岛孝康在江泽民讲演前的开场白中，谈及此事并表示反省。按理，可以用奥岛校长的讲话来启发人们对中日关系史上发生战争的认识。很可惜，新闻报导根本没有提及一句奥岛的讲话。这就是缺乏相互理解的一种表现。没有真正使口号和行动一致起来。

从现在起的未来，或者说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跟一九七二年恢复邦交，一九七八年签订「中日友好条约」时的情况相比，中日双方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首先，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当然，现在还是缺乏资金、技术，但比之改革开放之初，就不像当时对日本技术和资金的很大依赖性。在恢复邦交火签订「中日友好条约」时，中国的出发点在于利用和日本的关系来对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如今，苏联已不存在，与美国的关系取得调整。中国跟美国、俄罗斯都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而跟日本建立的是「睦邻协作的伙伴关系」。一九七二年以来，中国的国家领导层有了变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跟日本打交道的多，在签订「联合声明」时，毛泽东大手一挥，不计前嫌，就一笔勾销了「战争赔偿」的豪举。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中国坚持按国际惯例要日本赔偿，那就不可能发表「联合声明」，也就拖延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恢复；另外，当今日本否定战争责任的言论也可能不会这么嚣张了。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与欧美国家的历史背景多于跟日本关系，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展。

其次，从日本来说，七〇年代的日本确实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九〇年代以来，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这也影响到国际关系中的日、美、中大三角关系和东北亚的日、韩、中小三角关系有所变化。因此，采取了加快扩军步伐，扩大自己在亚太地区政治影响力，并利用「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将自己的潜在军事力量转化为亚太地区的安保优势，藉以扩大自己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在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种种矛盾和摩擦。可以说，今后两国关系中，相互的竞争和对抗意识会有所增强。说得严重一点，即在未来的二—四世纪或半个世纪里，很难说不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那么，要将矛盾和冲突防微于杜渐，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要珍视历史，牢记教训，充分重视“化干戈为玉帛”这一珍贵的历史经验。现在时兴的一种观点，称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似因“同文同种”，中日就必然能友好。其实，不然。我的观点是：中日两国既不同文，也不同种，但不同中有同，同中又有不同。加上中日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法、价值判断、心理素质也有很大差异。日本人务实、精算；中国人“大度有余，精细不足”。所以，过份强调“相同”往往会产生误解，应尽量寻找两者的差异，即从不同中去寻找“同”，求同存异，化异趋同，寻求加深相互理解的新途径。

为了加深相互理解，就需要通过频繁的交往和接触。除了两国官方的、高层次的接触以外，加强两国不同层次和方面的民间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中日友好教育和交流，更显得十分重要。

四、兼谈东亚同文书院大学

这是一个兼有中日之间友好和非友好关系的问题，情况较为复杂，双方分歧点也较大，极须我们加以深入研究。本人对此已关注多年，收集了一些资料，今天因手头没有资料，故只能粗略地谈谈：东亚同文书院与中日教育关系。

(一)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经历

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它的前身是荒尾精创办的

日清贸易研究所，这是一个培养商务人才的机构。一八九八年兴亚会和东亚会合并成立了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磨。该会成立以后，在当时为中日亲善，要推动中国的教育，故率先成立了东京同文书院，专门招收日本学生学习有关中国方面的知识。一九〇〇年又在南京成立了同文书院。此后，又在天津建立同文书院（中日学院）、汉口同文书院（江汉中学校）。一九〇一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设立，南京的同文书院也随之并入。在上海也经历了好几次的搬迁，最终在今上海交通大学，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后撤销。以上三校中，天津、武汉二校是在二〇年代建立的，只有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早在一九〇一年正式成立，后来还设立中华学生部，开始招收中国学生。

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近代以来在海外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时间最长，规模也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

(二)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教学研究活动

这是以学习语言和商科为主的高等专门学校，在一九三九年升格为大学，总共有四二期毕业生，总人数超过五千人。据现在调查大概有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一千五百名毕业生还健在。他们其中还有不少人在政界、学界、财界、外交界活动，在现实的中日关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从学校教育角度讲，作为商科专门学校所开设的课程相对于中国来说，富于近代性和现实感的，这也是日本明治以后的近代教育的体现。特别是他们结合实际，每期学生都要进行“教学实习”，到各地搞社会调查。这些调查资料的手稿本现收藏在爱知大学图书馆。这对

于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是很有价值的。但是，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特别是中日战争全面展开后，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学生被分配到军队中当随军翻译，也就是说，是有组织地直接参与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战争。因此，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中，有人称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别动队”。

自战败以后，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撤回日本。由于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本间喜一先生以及其他先生的努力，进行了多方交涉，在爱知县丰桥办起了爱知大学（本间先生也是爱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把当时从上海撤回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图书资料等转移到爱大。这样，就有了爱大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继承关系。再如曾担任过日本驻罗马尼亚大使现霞山会常务理事小崎昌业先生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第四二期生，也是爱知大学的第一期生。也正因如此，中日邦交恢复以后，爱大与上海交大建立了姊妹学校的友好交流关系。爱知大学确实在中日友好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如编纂的《中日大辞典》，迄今已出版了第三版，在两国很有影响，还有《中国政经用语辞典》的出版。在近年又成立了“现代中国学部”，这是日本的大学中以研究中国为对象和命名的第一个学部。去年九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霞山会成立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该学部长加加美光行先生也参加了会议。

（三）对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评价

目前，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中日双方共同一致

的方面极少。这一方面由于教育跟政治外交的关系太密切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它的深入全面研究尚很缺乏。本人对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的关注已多年，收集了若干资料，并把它放在当时中日教育关系中去考察，初步形成的基本观点是：笼统地全面肯定或者彻底否定均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从整个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去分时期、分方面，区别不同人物地进行研究；对该校的政治作用与教育影响这两者间既有联系又相区别地予以评论；无论持肯定论者或否定论者，都应该本着历史事实，全面地、历史地作出分析，着重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目的在于推进当前和今后的中日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

结 语

一、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可以作为一个总的概括：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在吸收欧洲近代文化过程中）互为桥梁，（无论是友好或非友好时期）始终不断。这十六个字可概括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根本特点，也为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因此，值得称道和珍视。

二、由于时代、形势和民族性的变化和差异，中日关系中往往会发生摩擦和冲突。为了防微杜渐，把摩擦和冲突的因素消除在萌发状态，必须加深相互理解。这是中日友好关系健康持久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要把友好的种子深埋两国人民心中。

三、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中日关系史上的友好、非友好都应值得珍视。因此，我们应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

地对待它们，克服民族偏见，求同存异，追求共识，用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推进未来的中日友好交流。

以上，也许因我从事的职业关系，历史讲的多了一些。如有不妥，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注一 この部分は筆者に誤認がある。東京同文書院は中国人学生に日本語を教えるため設置された。南京同文書院は義和団事件にまきこまれるのを避けて上海に移り、校名も変えた。

注二 本間先生は第二代学長。図書資料は東京の東亜同文会に所蔵されていたもの。